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Luc Boltanski, Ève Chiapello

[法国] 吕克·博尔坦斯基 夏娃·希亚佩洛 著 高铨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Luc Boltanski, Eve Chiapello

[法国] 吕克·博尔坦斯基 夏娃·希亚佩洛 著 高铨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 (法) 博尔坦斯基, (法) 希亚佩洛著; 高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3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ISBN 978-7-5447-2557-6

I. ①资… II. ①博… ②希… ③高…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958号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by M. Luc Boltanski & Mme Ève Chiapello

Copyright © 1999 by Editions Gallim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151 号

书 名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作 者 [法国]吕克·博尔坦斯基 夏娃·希亚佩洛
译 者 高 铨
责任编辑 陈 锐
原文出版 Gallimard,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3.75
插 页 :
字 数 : 41 千
版 次 : 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57-6
定 价 : 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当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英文版序

1994—2003

自从我们组织起工作规划并在五年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所以,或许值得简要描述一下本书形成时期的一些特征。我们为了应对近期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理论定位的各项决策,实际上可以通过追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法国学术与政治形势的某些因素来加以阐明。

论及资本主义

第一个特征听来相当简单(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却并非不重要),就是说:除了少数所谓老式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濒危物种”)以外,实际上没有人再谈论资本主义了。这个词语干脆从政治家、工会工作者、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语汇中被剔除了,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家,他们早已把它从历史上遗忘了。在这方面,特别惊人的是(只举一例),原先猛烈攻击“资本权势”的政治生态学话语,似乎已遗忘了破坏自然资源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之间的关系,而这在十年前还是很明显的。如果说英语世界的作者们(特别是美国人)还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话¹,那无疑是因为,这个词语在他们的学术和政治文化中——与我们在这些方面相

比——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较少,所以,旧世界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宁可忘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则是到处都在谈论着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个突出的对比。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法国社会学谈论资本主义的过程。

ix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谈论资本主义是由不同程度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由于阿尔都塞主义导致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主要的范式。这种范式有时显示为“回归本源”,旨在恢复纯正的马克思的思想;有时则把自身嫁接到其他传统和作者身上——特别是,一方面是涂尔干和韦伯,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这些不同的“学派”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双重野心,其矛盾性质总是未被理论说明,甚至未被承认。一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激活社会的实证主义观和历史的科学主义观(社会由“结构”所构成,被“法律”所占据,受摆脱社会行动者意识的“力量”所驱动;而历史本身所遵循的进程并不直接依靠受制于它的人类意志)。另一方面,它们设法与这些年来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充当其批判先锋。根据这种概念,社会学必须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

现在,以我们看来,这种双重导向违背了价值问题,特别是道德价值和理想。因为它旨在探究行动者的意识,并揭开他们无法掌控的结构、法律和力量。科学方法可以把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意识形态”来处理,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概念,可以把它们作为力量对比的一种虚伪外壳(总是不说明为什么需要这种面具)。相反,批判的激情预设,用以批判现实的理想是可以相对比的。

同样的自相矛盾也发生在行动方面。对历史结构、法律和力量的强调,往往会缩小有意识行动的作用。事物就是如此。可是,如果不相信它可以用于扭转人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本身有助于改变事物进程而走向进一步“解放”的话,那么批判态度就变得没有意义。在皮埃尔·布迪厄阐述的统治社会学中,这种紧张是特别明显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要揭示一种“机制”,通过它来实施作为铁律的普遍“统治”,而与此同时

又力求推进为摆脱外部势力和外部干预的个人解放的工作。但是,说到底,如果一切关系都可归纳为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而这又是“社会的”秩序中所固有的一种“规律”;那么,用义愤批判之辞来揭露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昆虫学家不带感情地套用它们来研究蚂蚁社会。

面对这些疑难,而且处在抗议运动消退和马克思主义衰落的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们在“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学会”内曾接触过)设法重新探究行动与道德价值的问题²。在行动领域,问题在于寻找一种语言,使之有可能把人的行动描述为并不是去实现结构所铭记的潜力,或者去执行一项既定的计划(说到底,就是不认为真有所谓行动的事),而是因为它们预设,决定与冒险都是按照人们自身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来采取的。在道德价值领域,问题则是认真对待人们所声称遵行的规范原则与理想,而不是把它们归结为仅仅是意识形态伪装或虚假认识的表述。最后,这些思潮的目的在于提出社会秩序问题及其“实现”方式(这是所有社会学都无法避开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先验地归结为行动者无法控制的力量相互影响。 x

恢复批判的前景并未偏离这项事业。如果同意(且那是可信的)批判会预设规范的支承点,那么,要对行动者提出的批判加以认真对待,就有必要把规范的迫切需要设置为批判指向的目标。所以,对行动者声称遵行的价值不加关注的批判性社会学,必须被批判的社会学所取代。这里也必须说清,这种做法并不是要把批判束之高阁,而是相反,要使它的基础更为坚实。这种经由批判的社会学的迂回,具有启发式的意图,而不是一种政治谋划。

强调行动和道德价值的80年代社会学,往往导向实用地分析人们在具体环境中进行的行动、正当性和批判,提出行动者为“完成”或“构建”某种“社会性”而实行的措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达成和巩固协议,批评现有的安排,等等。这种分析已经被谴责为,一方面忽视力量对比而提出社会和平观,另一方面把自己禁锢在服从于观察的微观环境

描述,而忽视在更广领域内实现的进程,它包罗多种行动者且是长期的进程。作出这样谴责的,往往是一些仍然信从(虽然通常是含蓄地信从)接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社会学家。

这适用于谈论“资本主义”,它从我们刚才简要描述的社会学思潮中消失了。“资本主义”从70年代主要概念的地位上跌落,已经沦落到低下的地位,成为一个有点粗鄙的诅咒,因为它含有许多社会学家们希望忘却的马克思主义词语,而且也因为它涉及某些无法通过观察具体环境来立即看清和描述的过于“庞大的”事物。

再过十五年,我们仍然会问:社会学能否真的不去提及长期以来掌握的重要实体,而不牺牲它可能对当今的许多说明。设法描述各种具体环境状况的社会学,以及人们在其中构建这些安排的方式,显然可以激励对社会结构的各种“修复”。这要由工作“参与者”或社会“工程师”日复一日地进行,但却不可能帮助构建更广大的集体项目——从一开始就构成社会学一部分使命的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只字不提资本主义,同时还对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的变化感到某种惊讶,这些变化是不能被忽视的。由于缺乏宏观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力求在全面“变异”与影响日常生活主要方面的局部转变之间进行协调。前者往往是经济或技术必然性的习语,或者甚至是生物学进化论的术语;后者包括工作条件、失业、生命周期、收入、不平等、教育、感情和家庭生活,等等。这些联系根本不是以某种方式作为体系建立起来或至少组织起来的。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社会阶级”一词上。从1950年至1980年,这个词语在欧洲社会学中突然消失,即便不平等的种种新形式在80年代不断增多。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是肉眼可见的,欧洲人曾对美国大都市中比比皆是的无家可归者颇感惊愕,而现在却惊讶和焦虑地发现他们自己的城镇也同样充斥着这样的人了。但是,他们并未严肃地正视,这种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进驻他们熟悉的公

共空间。这就是一个不同主题——“排斥”——流行起来的来龙去脉,其意图至少在理论上是要调和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信社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际消失,认为他们会被“庞大的中产阶级”所取代;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城市中心区沦为贫民窟的确确实实的现实。

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上花费的力气。我们设法构建一个框架,使之有可能把基于批判性社会学的观点,同来自实用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前者指的是有能力在很长时期影响大量人群的超个人实体(特别是资本主义);后者则遵循批判的社会学的纲领,强调行动及激励有意识行动的规范性需求(特别是批判措施)。我们感到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去,但并不抛弃实用社会学的贡献:本书就是作为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我们特别使用了在《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³,它突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批判和正当的行动,并提供一般惯例和等价形式,可以对正当性和批判给以合法性。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有限环境中逐个地描述批判行动,而是要突出在资本主义动力下批判所起的作用,并且构建一个规范的变化。 xii

本书是以1965年至1995年为中心,因为这个时期特别有利于这样的研究。初始时期(1965—1975)以一场紧张的批判运动为标志,恰好又逢一场资本主义危机;而在随后阶段(1975—1990),批判却同时顺从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和复兴。这种复兴最终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规范支承点逐渐构建起来,那就是《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新“城市”的意思。

在更为实际的方面,我们的意图是:一方面,描绘一幅使发生的变化更易理解的图景;另一方面,用同样的图式来说明解释上的缺陷,特别是批判的沉默,这看上去是我们所处时期的主要特点。

研究批判和进行批判

在批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性社会学,使它和资本主义的

老题目相混合,这是我们的野心。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分析对象来从事这一研究项目呢?由于缺乏社会批判而出现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特点,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起一种双重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批判在历史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作用,这项工作是基于更一般的标准变化模型,我们工作的主要理论目标之一就是建构这种模型。第二,我们设法把它移置到一个宏观社会环境,把它与《论正当性》一书中的理论框架相比较,从而加深各种相对而言不可调和的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和批判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碰到构成本书主旨的一种区别:社会批判与我们称之为艺术批判之间的区别。前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史相关联且强调剥削;后者来自知识界与艺术界,特别是19世纪巴黎豪放不羁的艺术家,这种批判把资本主义领域的非人性化作为其特定目标。这样做,我们并不会幼稚地意识不到,由于环境所迫,我们的工作描述方面会带有政治的一面。再者,不管愿不愿意,一切事业(例如19世纪小说的事例)岂不都是这样吗?它们的目的就是创作一幅“社会”图景(假定那是一种描绘,尽管其意图是

xiii “自然主义的”描绘,但也总是一种说明),由此打开了判断的可能性。

我们仍然有责任澄清我们所要恢复的那种批判,以及我们作为“批判者”(而不是简单的“批判分析者”)的地位。首先,社会学分析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要表明我们分析的实际含意时,我们特意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必定要说的话包罗在本书的“后记”中)。这是为了避免作为君王或主教的专家顾问般的傲慢,以及作为纸上谈兵式的革命家的不负责任(马克斯·韦伯所谴责的当时的“职业社会主义者”)——它们的权力基于一种双重(“科学的”和“政治的”)合法性。众所周知,这在不久以前已导致前所未有的知识界恐怖主义形式。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有助于恢复批判,不但恢复它的内容,而且恢复它的形式与目的。这里,我们把卡尔·波拉尼和艾伯特·赫希曼视为我们的楷模,他们的著作始终是支持之源。

为了遵循我们已经标明的路线,我们无疑要作出的主要牺牲包括

激进主义和总体设计，这对于欧陆传统训练出来的研究者尤其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相对而言，我们力求分解细节，例如剥削的新机制的细节（从而追随所谓“真理在于细节”的列维—斯特劳斯式格言）。由于决心坚持细节，加上缺乏财源来配备一支庞大的工作队伍（但这种庞大的项目往往具有工业化式研究的有害效果），使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主要局限在法国的事例上。理想的计划应该是在同样时期、以同样方法在若干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但这还有待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分析所指的批判形式（如果必须指出其特点，可以说它们是“改良主义的”）不是“革命的”。如果（19世纪初以来，情况常常是这样）“革命的”立场意味着描绘资本主义领域的人类境况，而且更一般地描绘当代工业社会里的人类境况，它与人类命运如此相异，或者说如此“疏离”，那么，批判的唯一可能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新人”⁵。我们特别反对这种概念的一个含义，即使批判摆脱形成它所根据的规范性立场的要求。因为它总是相信，在现今构成的世界里，只要革命还有待进行，就没有一种规范性立场是做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真正可以想象的。那么，只做批判是可以的，这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人们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归诸批判，而无须表露自己的规范性预设。这种立场只要不是简单的虚无主义或庸俗性的，最后总是归向“科学”——不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还是今天的绝对主义社会科学——以及间接地归向革命者和科学家的联合体，他们掌握必要的材料，是人类行动的最终仲裁者。这就要牺牲世上最广泛持有的一种公正常识。这里我们遵循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批评者团伙》这本精彩著作中对20世纪社会批判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同化批判的能力，因此我们肯定了这一立场。一切意识形态，不论其宗旨和规程多么激进，最终都证明会向同化敞开大门。而且，它越是综合和全面，就越加乐意放弃平凡、乏味的领域（“小资产阶级”一度用这个词，指那些在工作条件、保住职业、分享增值、学校教育、可养育子女的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日常斗争）而主

xiv

张宏大的预言性要求。

这特别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那么仔细地观察旨在把新形式的保障和公正引进一个以灵活、机动和网络式组织形式作为基本参照点的世界上去的机制,由法学家或经济学家等提出的这些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人们讨论。在理论层面,对这些机制的分析使我们赋予项目型城市以实质——我们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一种规范性新支点——而从更加实际的观点看,它使我们能认清批判似乎最抓得住的一些地方。

可是,我们必须澄清一种带有理论和政治含意的误解。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完全不是要去帮助建立那种“项目型城市”,或者甚至是力图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立即可到手的新“城市”(我们的做法一直受到批评)。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描述性的,主要是设法汇集相当广泛的不同学科(管理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的作者,旨在为实现项目型城市的试验而提出的种种机制。至于可称为我们这方面的“个人”立场,则不在本书正文之内,而是在本书后记内表述。我们相信,任何有助于稍稍减少工薪阶层不安全感的东西,都比没有强。首先是因为受苦将减少,我们没有时间搞“更糟的政策”;而且是因为,整部工人阶级运动史已经表明,当不安全感减少时,就会导向批判复兴的情况。我们不是政治战略的专家,因此我们现在感到,建立使工薪阶层有更大安全感的机制(即便这些机制与争取灵活性的要求作了妥协)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如果同时

xv

同时进行理论与实际工作,以这些机制为基础来实行更为有力的批判复兴的话。

所以,首先对批判赋予了一种“改良主义的”作用,并未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一旦抛弃了支撑“革命”的救世主所期望的形而上学建构,特别是一旦放弃了对“新人”的预期以后,对“改良”的要求怎么会迥异于“革命”的承诺呢?改良也可以是激进的,可以相当深刻地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事实上,关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整个辩论背后,有着一个今天很含蓄的主要问题:就是行使暴力的合法性。之所以含蓄,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及法西斯国家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以后,仍然鼓吹大规模

模使用暴力的人比起索雷尔时代要少得多了。但是,如果以革命需要为由而支持暴力也遭到拒绝,那么改良主义运动怎么区别于革命运动呢?

怎样对待批判? 扩大和混乱

在这篇“序言”的开头,我们着重谈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叶与现今之间变化的背景,其中涉及批判的地方特别容易引起兴趣。

首先,由于我们的书最初是在 1999 年末出版于法国,我们见证了批判的迅速复兴,确实比我们写第六章时所预计的要迅猛得多——这一章专注于 1995 年以后批判的重新复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中开展批判的速度已经汇聚成一场对全球化的全面批判,其高峰是在西雅图、热那亚或者阿雷格里港。

但另一方面,在建立有能力控制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减少其破坏性的机制上,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上的停滞。在法国,“新经济”所带来的欢欣迟迟未到(这可以相当准确地追溯到 1999 年末,或者纳斯达克于 2002 年 4 月崩溃前的两年多一点),在使社会党政府把大部分措施束之高阁上肯定起到重要的作用。⁶ 这很可能导致了既有的左翼在 2002 年 4 月的总统选举中惊人的失败,以及很大部分选民对极右翼或议会外的极左翼投了“抗议”票。

意欲发挥总体影响的机制也是如此,它们的实施看来在当时具有更加空想的前景。在这方面,和我们写作本书的时期相比,事情没有多大变化;至少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正从容地自行调整其能力,不但提供我们所谓的“激励”(当新机制成为老生常谈时,它就提供得越来越少了),而且提供保障与公正。

xvi

回顾起来,至少可以认为,我们的工作 in 恢复批判上有些胆怯(恢复得比我们预见的要快),同时却肯定对批判效果过于乐观(暂时看来效果不是立竿见影)。

而且,对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再度壮大一事,相对而言,既无

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又无确切的实际分析,也许可以说明,或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当前自相矛盾的情况,其特点是:批判无可否认地重新展开,而那种批判又显然处于混乱。我们可以察觉到这种混乱的一个初始迹象:一方面,老活动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着普遍的怀旧情绪(当时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确实存在的共产党国家军队的威胁,认为这“使得老板们住手”);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则被陈旧的革命话语所吸引。

我们认为,还有一种迹象,就是想把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集中于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式和利润榨取)转变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法国,这种行动转化为通俗反美主义的高涨。看到义愤脱离了具体的、斗争的场合而让位给面对外部敌人的共识,即便是涉及到“全球化”及其“代理人”,也总是令人困扰的。

眼下,也很难看清我们所谓的“艺术批判”的兴起会走向何方。如果相当普遍地承认(肯定比五年或十年前更清楚)法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采取的批判形式(显著地强调个人解放的革命一面,特别是在性解放上)已趋于穷尽,那么,为了识别当前主导的“异化”模式,应当考虑哪些征象就非常模糊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识别左、右翼政治特征标记的混乱,而在不久前这是很容易分清的。例如,在最近围绕农民联合会进行动员的事例上,我们看到一个捍卫农业反对全球化劫掠和转基因的运动,它被视为既是“左翼的”又是“反动的”,这取决于把重点放在它那相当矛盾的立场的哪一边上:赞同世界范围的公平贸易,还是保护传统的法国农业?

xvii

回应一些批判

自从本书在三年半前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同事们的若干批判。尽管内容不一,但某些主题却在这些批判中一再出现,或许是因为它们突出了我们工作的最明显缺陷。但至少有些事例中,批判抓住了我们

试图展开的代表性观点，它们说明了我们的事业同社会科学近期其他理论努力之间的联系。因此，值得把它们提出来，并简要说明我们认为自己能够作出的回应。

惯例经济学和调节理论

最初的一种批判认为，我们的立场笨拙地处于经济学分析的两个新近潮流之间，而这种批判在法国知识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非常活跃的辩论中颇为典型。这两个潮流就是：惯例经济学——它的发展与我们力求创立一门实用性批判社会学的活动密切相关——以及调节学派⁸的著作。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确是有意寻求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而有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从惯例理论中，我们得出在等价原则的意义上澄清惯例的必要性，以便对人（和对物）进行比较，只要他们（它们）构成经济关系中时常不大看得见的基石，而且构成不同行动者对他们（它们）进行判断的基石。例如，根据不同质量的惯例所做的交易；至于生产，那是根据不同的协作惯例。

根据调节理论的精神（即便不是根据字眼），我们采取了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的方向，以及强调存在积累制度的结构主义方向，也就是说（转化为我们的语言），某些惯例和检验在特定时刻和特定社会形态下具有战略地位。这些惯例和检验是既成的，这意味着它们都是组织成一个体系的、由法律机制所结合的，并且落实在组织机构中。但是，我们对这些体系不是给予一种类似机械的操作法并使之实体化，而是在我们的描述中结合进有关行动者对这些惯例和检验所作的解释和批判。

对技术革新的估计不足

我们也同样被批评为不给技术变革（特别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及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以应有的空间。我们没有忽视组织公司的新方式所带来的效果与效能，那是特别但并非全部由新信息技术所促成的。我们

在本书一开始就写到了资本主义的复兴。而且,我们所阅读的管理材料充满着对这些“经济”好处的赞美。

但是,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以便不是把技术孤立为一个独立变项。正如新的科学社会学无可辩驳地表明的,技术变革远非独立于其他方面的社会存在。例如,如果我们遵照布鲁诺·拉图尔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无数可定为“道德的”事物都牢固地具有技术方面。“消费者需求”及其多少不稳定的性质,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消费者口味以及消费者需求的迅速变化过程,与有关艺术批判的需求(特别对于“真实性”的需求)并非没有联系(至少这是《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所捍卫的命题)。这转化为一种消费者个人化的消费要求,而有别于一切形式的“大规模”生产。总而言之,本书的意图不是要否认技术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那是荒谬的),而是根据波拉尼式的想法,要打破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论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超越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

其他的问题围绕着我们的书是否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内模糊回归的构成部分(以德里达的用语是伪装成“鬼魂”,或者如齐泽克所说的“幽灵”)。有些批评家——怀疑他们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谴责我们的著作中有不敢言明的隐蔽马克思主义的复起。我们让他们去幻想吧。其他人——这一次是亲马克思主义者——责备我们“在精神上偏离”,说我们把“观念”和“精神倾向”作为历史的动力。

更为严重的是,动机最为善意的作者们,却试图把我们著作的意思以“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来解释。可是,我们设法树立的理论建构——早在《论正当性》一书中所阐述的初步工作——正是旨在使这种二分法成为多余。我们受马克思·韦伯、卡尔·波拉尼和路易·迪蒙所影响的出发点,正是设法复活资本主义动力问题的同时,无需使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些范畴的局限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变得很明显,而且,在我们看来,它们特别不能正确地对付意识形态的问题。⁹ 这种概念